

# 高校改革与发展参考

09年第12期(总第14期)

中国矿业大学发展规划处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

---

##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建设高水平大学及其重点学科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奋斗目标。建设一流大学,使之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国内高等院校向一流院校迈进,与世界一流院校比肩,这将是目前处于国内院校前列的高校今后发展的目标。目前,国内大学发展已从处延发展阶段转入内涵发展阶段,从数量积累阶段转入质量提升阶段,从国内竞争阶段转入国际竞争阶段。国内大学虽然从院校规模到培养人才数量等各方面都发展迅速,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本期《高校改革与发展参考》关注相关话题,刊摘四篇文章,既有人民日报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的专访,也有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回顾和对差距的反思,以期起到拓宽视野、学习借鉴作用,在矿大百年校庆之际,为更好完成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提供资讯。

# 本期目录

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3
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思考·····	7
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19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缺失与建构·····	24

## **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 **——对话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

正在科学发展轨道上高歌猛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呼唤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更高标准的教育公平，更呼唤着代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问题，近日，记者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闵维方教授进行了对话。

####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11年前，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国开始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目前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列为重要议题。国家为什么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如此重视？为什么将它确定为国家战略？多年担任北大领导，长期从事高教研究，您对此有什么认识？

**闵维方：**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其中，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同寻常。我认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际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也必须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从世界范围看，无论英国、德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美国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说，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他是指1870年前后那几十年，德国的大学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

**记者：**也就是说，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问题。

**闵维方：**是的。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一定要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

**记者：**我们了解到，作为中国大学的“排头兵”，北京大学迈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实步伐。与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相比，您认为像北大这样的高校还存在哪些差距？

**闵维方：**的确，在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例如，我们形成了以87个国家重点学科为主体、前沿交叉学科布局初具规模、文理医工综合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体系，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过去10年论文引用数据，我校有12个学科进入了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我们形成了以60位院士、22位文科资深教授、100位长江学者、13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中心创新团队为核心的，总数达300多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拔尖人才梯队；我们形成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本科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和导师遴选方式更加科学。

但是，与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有数百年历程，北京大学的的历史才有110年，真正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才30年。以办学经费为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捐款基金都超过百亿美元，每年的运行经费为20亿美元左右，我校与之相比差距非常大。

**记者：**判断一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闵维方：**当然，看一所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质量。当前，我们和国际上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不是学生生源，也不完全是财力和物力的投入，最主要的是教师队

伍的结构和水平。面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名家至关重要。

应当看到，在我们这样的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体制机制障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就要求我们立足现实，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创造一流学术成果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 **实现跨越式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

**记者：**重视一流大学建设是许多国家的共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在我们“快跑”的同时，世界各国的高水平大学也在疾驰。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拉越大？

**闵维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1860年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200多所院校大多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的，以培养绅士和传教士为主要任务。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通过学习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记者：**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过哪些先例？今天的跨越式发展有什么特点？

**闵维方：**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北大曾经历过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学术气氛沉闷，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跨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百年校庆后实施“985工程”以来，北大又同全国高等院校一道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

跨越式发展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范式，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北京大学正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着力创造相应的体制和环

境，使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创新潜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 **科学把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律，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任何大学都十分重视从自己的国情和校情出发来谋划战略、打造特色。在您看来，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如何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优势，彰显个性，办出特色？

**闵维方：**有特色才能有竞争力，才能有高质量。在这方面，美国的一流大学有许多成功范例。比如，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独辟蹊径，提出“专家社区思想”，创立与工业密切结合的科技园区，造就了“硅谷”奇迹。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一所只有几千学生的大学，但它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和艺术学科等几个较少的领先学科的独特优势而扬名世界。

**记者：**从北大的实际来看，应当从哪些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闵维方：**我认为，北大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就必须着力避免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质量优先、以内涵发展为主的原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上，着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和重点突破，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把北大 80 多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的若干学科率先推进到国际学术前沿，就会大大提高北大的国际学术声望，引领全校学科水平的整体提高。

**记者：**基于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北京大学将未来的发展确定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请问北大将怎样去实现这样的目标？

**闵维方：**我们将自己未来的发展确定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改变高校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研究过程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型人才。在 110 年的奋斗历程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自由探讨、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我们高度重视这些历史传统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积极推动作用，并

以“常为新”的北大精神来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努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和谐校园文化。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心浮气躁。我们将始终坚持科学发展，通过不懈的奋斗，向着世界一流的目标迈进。

（摘自：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网站，2009-9-7）

## 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

王孙禹，孔钢城

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盛，与教育的地位和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出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奋斗理想。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我国才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及其重点学科”，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211工程”和“985工程”，两项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工程的开展，标志着我国开始集中建设一批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大学特别是里程碑式的标志——“985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开始，也同时标志着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实践的启动，使建设一流大学成为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行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同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 一、研究型大学共识与诉求

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彻底结束了我国知识界、教育界长期处于被批判、被排斥的困境，大学逐渐取得社会认可，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也逐渐上升。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日益呈现出团结合作的趋势，特别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大学获

得了较多的话语权，而政府也希望得到大学专业化的智力支撑和舆论支持。其表现在改革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念和前沿构想，往往是由专家学者首先提出，然后被社会所认可。比如，真理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公正等重要理念，便是由知识群体率先提出，进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样在国家重要建设工程或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中，政府与大学的合作也日益增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的构建进程，事实上是政府与大学取得共同诉求的过程。

政府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中心。它可以把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它颁布的有关法令制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具体是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各级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政府中央政府、教育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是为了尽快适应国际竞争和科技发展趋势，或是为了增强地方科技实力和地方声誉，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事实上，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推动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决策和行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过程中，另一支力量就是大学。大学中有一大批知识精英，特别是那些在大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教界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从国际视野和高教发展的态势出发，大力倡导全社会重视教育，大力倡导建设高水平大学，从而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

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中，政府与大学表现出了完全的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告别了民国时期移植西方欧美博雅教育传统，进入到专业化教育的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经过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体制调整 and 高等学校调整以后，我国的大学建设被纳入国家化和政治化的过程当中。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加快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情况下，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了重点大学建设的策略。继1950年我国政府确立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示范学校为重点建设大学之后，1954年10月，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重点高

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确定了所重点大学上述两所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1959年5月，中央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将全国重点高校数由原来的6所扩大为16所后又增加到20所。1960年，中央决定将重点大学的数量增加到64所。此后又不断增加重点大学的数量，使重点大学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政策。

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重点大学制度基础上开展的。应该说1950年代以后的重点大学建设源于强大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国家认同，与是否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无关。而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和学界自下而上地形成共识，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构建起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

首先从学界来看。早在1983年5月，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四所高校的名誉校院长匡亚明、刘丹、李曙森、屈伯川四位老教育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将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史称“835建言”。四老的“835建言”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这实际上是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思想的萌芽。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快人才培养、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能力，使我国一部分学校尽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同样是在1983年，袁集等撰文《重点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根据美国著名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科学研究中心，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指出要努力把重点大学建设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等学府。该文认为科学研究是我国重点大学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

1987年初，原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撰文《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试论天津大学的办学方向》。吴咏诗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天津大学要向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努力。他从学生结构、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探讨了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并提出

“坚持改革，着重提高，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原则。应该说这是国内最早明确提出研究型大学办学方向的学者。

此后，南京大学学者龚放连续撰文讨论在我国开展重点大学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虽然他在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但是他借鉴欧美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历程，指出在我国开展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实施重点建设，从而推动重点建设高校的学科实力、科研水平，使之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这正是研究型大学的内涵所在。此后，倡导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学者逐渐增多，19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研究型大学的文章和著作较多地涌现出来，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我国一些重点大学纷纷提出要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清华大学在1985年提出“争取在九十年代，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1993年，清华大学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到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周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江泽民同志“把上海交大办成第一流大学”的题词后，明确提出了用20年的时间创建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目标。中南大学则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了建设国内同行业第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的目标。浙江大学也在1980年代末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目标“使浙江大学建设成为高级理工人才、立足于国内培养的重要基地成为从事高科技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高科技产业的重要辐射源成为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科技和发展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成为吸引国外智力和国内外优秀人才的教育和科研中心。”众多学校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加剧、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自觉主动地面对挑战、希望加快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

与之相应的是来自中央领导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注和参与。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始，在听取方毅、刘西尧同志关于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时就指出，“要抓好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确立了重点大学具备“两个中心”地位。之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加强重点大学的建设问题。在中央

领导的关心下，教育主管部门加快落实重点大学建设。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恢复“文革”前68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增加20所高校为重点大学，重新确定88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84年4月，国务院通过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将10所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请示报告》，决定“七五”期间国家安排专项补助投资5亿元，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医科大学7所大学加速建设之用，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加速建设投资，分别由有关部门在相关投资中调剂解决。此后，1987年和1988年，国家教委在全国确定416个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点，涉及107所高等学校，利用1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其他渠道的经费，进行了重点建设和补助。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培养尖端创新科技人才，国家开始实施“211工程”。1993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211工程”的建设目标为力争到21世纪初，我国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学校管理等方面能与国际著名大学相比较。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继续重申了“211工程”的主要精神。

“211工程”在1995年制定总体建设规划，并从1996年正式实施建设。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出席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明确提出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教育部决定首批重点建设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希望通过一定时间的重点扶持和建设，使这些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985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践全面开展，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一批重点大学。

2007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以科学研究见长的研究型大学是保持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必须加快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其配套政策，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

由此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学借鉴国际经验、顺应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适时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设想。同时，中国政府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深切感受到教育对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努力倡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政府和大学在高水平大学建设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主导下形成了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政策和管理体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各方面给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使我国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学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二、研究型大学战略与成就

研究型大学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各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发挥着经济发展“加速器”、社会进步“推动机”和政府决策“思想库”的作用。在为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重大决策、战略规划提供高水平咨询和政策建议方面，在推动国家和地方教育改革和人才战略方面，成就斐然。

### （一）研究型大学的实施缩小了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

我国最早设立研究生院的所大学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中的首批成员，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211工程”发展报告（1995—2005）》把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中的28所大学与美国大学联盟进行了对比分析。美国大学联盟是世界公认的研究

型大学群体，于1990年成立，是由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成的一个专业协会，至今拥有61所美国大学成员和2所加拿大大学成员，其成员有严格的人选标准。AUU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评价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水平方面，包括竞争性联邦科研资助数量、美国国家研究院院士数量、教师队伍质量和获奖情况、研究论文学术水平等。

(二)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造就了一批学术造诣较深、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一方面，教育部先后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引进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的优秀专家，增强了高水平大学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各高校还注重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各学校高度重视引进和培养具有良好潜质的优秀青年学者，并积极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扶持和激励这些“潜人才”尽快成长，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已经迅速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从两大工程建设的大学来看，在“211工程”建设高校中，45岁以下具有高级职务教师的比例逐年提高，2005年已达到33%，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比例显著增加，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31%，教师队伍学缘结构得到优化，具有外校教育经历的教师比率逐年递增。而在“985工程”最早确定的9所大学中，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比例基本都超过了70%，45周岁以下的专任教师比例超过60%，专任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超过70%，个别学校甚至达到80%，在专任教师的学缘结构中，有国内外其他高校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比例基本达到60%，特别是年轻教师中有海外学习背景的比例逐步增高，个别学校甚至超过50%，而在引进国际知名学者专家方面，这9所大学走在了全国高校前列，引进了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教授，其中不乏各专业最高水平奖项获得者。

(三)从人才培养来看研究型大学学生结构更加合理，人才培养质，不断提高，已基本实现立足于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目标

“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成为我国大学排头兵，尤其是在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截止到2004年，“211工程”

学校在校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分别占全国高校的84%、69%和32%，成为我国博士生培养的主力军。“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学校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合理招生，招生数量保持稳步增长，保证了学生培养的质量。

同时，各校在稳定本科生规模的同时，着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调整学生结构。1999年开始，研究生比例大幅增加。1999-2003年，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增幅基本维持在30%左右，硕士研究生的增长平均为21.3%。虽然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在1999年之后经历了大幅度的扩招，但是重点建设高校的本科生扩招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经历了1999年的扩招之后，重点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出现迅速变化。1999年，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招生人数，这在全国研究生培养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为1:1.22，清华大学为1:1.3。研究生规模的扩大，说明

这些学校的科研力量得到了加强。众所周知，规模的扩大必须以质量保证为前提。在研究型大学中，一批高质量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显示出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论文已经不再罕见。

1999-2007年，教育部共进行了9次“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审，选出了884篇优秀博士论文，其中“985工程”的高校人选优秀博士论文每年都在50-60%之间。

(四)从科学研究来看，各高校科研实力大大增强，开展学科前沿研究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明显提高，在开展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和解决，大科技问题方面成果卓著，取得了很多重大的研究成果

经过两大工程的建设，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基础得到极大改善，获得了国家大量的经费支持，筹集资金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有了明显增长。特别是“985工程”最早确立的9所大学，科研经费有了大幅度增长，部分学校的年度科研经费达到了15亿以上。由于学科的交叉整合和对优势学科的重点扶持，各大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

在“863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重大国防军工项目中，已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力量。高水平大学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不断增强，一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在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奖项中，最高奖项几乎都集中在重点建设的高校，在国家各部门和地方的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这些高校也占了绝大多数。此外，重点建设大学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大幅增加，体现了这些学校科学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五）从学科建设来看，研究型大学面对国际科学发展趋势，建设特色优势学科体系，学科整体水平大幅提高，部分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确定既涉及国际前沿的新兴学科，也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传统学科，还有亟待培育和扶持的薄弱学科。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各高校的学科层次和院系设置有了较大的调整，重点大学的学院和学科设置日益趋向综合性发展，基本形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格局。

优化学科结构，提高学科整体水平是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又一个重要成就。各高校确立了学科建设在学校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推进了学科布局的调整，优化了重点学科结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新兴的交叉学科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学科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基本建成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重点学科体系。在“985工程”建设中，教育部提出“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建设一批‘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和‘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和推动学科建设”。

各高校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和学科前沿，发展思路更加清晰，主攻方向更为明确，梯队水平明显提高，条件装备显著改善，一批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快速发展，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采用了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开发的ESI数据库研究方法，按照学科发展特点等因素设置了22个学科，根据论文被引情况对世界各国高校的

学科进行了排名。中国大陆地区进入ESI学科排名最多的所高校如表1所示。

表1 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部分大学的学科排名

大学名称	进入排行学科的个数	占22个学科的比例 (%)
北京大学	9	40.9
清华大学	5	22.4
浙江大学	8	36.4
上海交通大学	4	18.2
复旦大学	7	31.8

虽然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大学整体排名中还没有进入前列，但是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经有学科进入了世界一流行列，其中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和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学科的相关研究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清华大学有2个学科进入全世界排名的前10%。

### 三、研究型大学问题与思考

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中心、知识创新的源头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应该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提高原始性创新能力为中心，遵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目前，由于自身定位不明确，以及存在强烈的扩张冲动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

#### 一、避免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热，忽略高等学校的层次结构

在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自身，对“研究型大学建设”都有不同的视角，特别是对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我国1995年实施“211工程”、1998年实施“985工程”，以此来推动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目前属于211工程的大学有100多所，985工程有38所，在我国近2000多所高等学校的体系中，应该说这个比例是适中的，与美国等高等教育强国的体系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却多于美国，而高等职业学校数量却远远少于美国。近年来众多高校都奔着创

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希望能够进入到“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中。一流大学并非都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种倾向的存在，将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失衡，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近几年在我国不少地区出现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正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和分工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 二、避免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的平均主义倾向

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实施重点建设，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若干有条件的学校上但是由于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无论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大学的建设中，政府面对各种博弈不得不进行某些妥协，出现平均主义的倾向。正如一些大学校长指出的“我们目前开展重点大学建设，还是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国家制定计划，各有关学校就到处游说，积极争取，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参与其中，最终只得照顾各方面的关系，最后还是一个‘大口袋’。平心而论，依据我国的人、财、物力，我们是没有条件办好100所重点大学的。因此，在建设重点大学上，宁肯少一点，但应力求办得好一点，上得快一点。”

## 三、避免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大学自主权的失落

同外国开展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实践相比，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政府某些部门在政策制定和推行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学在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失语”，使得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大和集中，大学自主权不能得到体现。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本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进行，非程序化现象较多，信息不透明，缺乏必要的监督，带来较多的问题和矛盾。

特别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中，拨款方式、经费数量和项目流向主要是由财政主管部门直接决定，即使校长也无权力调控使用。这不利于大学自主权的发挥和大学实际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科研项目的运行和监督。

此外，加上国家财政体制的问题，学校的预算与拨款到位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某些专项拨款往往年终时才能到位，造成大学“需要花钱时没钱花，到了年底来不及花”，以致某些单位为了花完

某笔款项而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措施,导致政府拨款没有发挥真正的效益,造成了国家教育经费的浪费甚至腐败现象的滋生。

#### 四、避免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急功近利思想

研究型大学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需要有着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从目前来看,我国主要重点建设大学基本设立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全社会的殷切期望无疑使学校处于无形的压力之中。因为能否“建成”或者“跻身”世界一流,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从我国大学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来看,我国某些大学从某个或某些学科寻求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有可能的,但在短期内要整体跻身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中,面临不小的困难,因为改革与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原有的传统和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惰性。

#### 四、结语

发展教育从来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紧密相连。发展高等教育,增强综合国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于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今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今后高等教育对国家、民族和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是今天我们深入探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意义。高等教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成功和不足之处,有其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地把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运用于新形势、新阶段,与创新的战略、创新的理念、创新的体制结合起来,对于建设中的中国大学来说,是一笔无比宝贵的巨大财富。

(摘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7卷第1期)

# 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张武军, 徐 宁

进入21世纪, 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的生产与应用过程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研究型大学把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广泛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研究型大学为各行各业, 特别是引领带动型领域不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思维的建设者, 发展创造出现代科学与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层出不穷的新知识, 同时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目前, 研究型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

## 1 研究型大学的含义

“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源自美国的卡内基, 美国人称为Research university或Research - Intensive university。德国柏林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雏形, 霍普金斯大学是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开始相继提出研究型大学模式。研究型大学是以“教学与科研结合”为办学思想, 以“科研+ 教学”为学科发展模式, “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学科建设的布局、规模和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我国开始积极探索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 特别是“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的现有高校梯次大体为: 普通高校→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国家通过研究型大学作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突破口, 从而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 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佟福锁认为, “我国研究型大学约在80所左右, 即进入“211工程”建设序列的大学多数是基本上符合或趋于研究型这个层次, 而侯光明等认为

“‘985工程’所确立的重点建设的34所大学, 比较符合或接近研究型大学内涵的大学”。

## 2 21世纪世界各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计划

鉴于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巨大作用的认识, 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2001年日本出台《振兴日本经济、改革大学结构计划》，副标题是“大学改革拯救日本”，核心是在竞争的环境下重点投资建设30所世界高水平大学；把教育改革视为日本经济社会的“救世主”。之后，日本通过大学合并、COE项目、研究生院重点化等，极大地推动了“一流大学”的建设。

为体现2003年《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中提出的“大力改进科研拨款和知识传播途径，推进高校在世界范围的领先水平，强化大学对区域经济的支持”未来教育发展目标，英国在牛津、剑桥等世界古典一流大学的基础上，于2004年10月1日正式将曼彻斯特大学和曼彻斯特理工大学这两所研究型大学合并为新的曼彻斯特大学。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共拨款8200万英镑支持两校的合并。按照设想，新组建的曼彻斯特大学将是英国规模最大、学科范围最广的大学，将有能力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竞争，目标是进入世界前25名顶级大学的行列。

德国教研部2004年初提出了创建“精英大学”的计划。为此，德国甚至于2006年修订了联邦《基本法》，确定了资助“精英大学”建设的合法性。根据“精英大学”计划，2006年至2010年联邦和州将共同投资19亿欧元，建设10所“精英大学”。目前，已有卡尔斯鲁厄大学、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康斯坦茨大学等九所大学进入精英大学。

韩国制定了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开办研究生院的计划，计划到2012年建立10所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 3 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现状

“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使我国大学的创新能力、综合能力指数有了明显的提高，缩小了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可以看到，我国几所实施“985工程”的高校国际排名得到了大幅提升。五年内南京大学排名提前了100多位，这样的成绩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首先，在人才培养水平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到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

经费居世界第六。但是我国的科技创新指数却属世界中下水平。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2.26%,这说明我国高层次科研人才处于数量庞大但质量偏低、拔尖人才紧缺的局面。第二在投入方面,我国的大学与发达国家的大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师资队伍水平也是明显不高,缺乏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大师和杰出学者。培养和吸引顶尖学科带头人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教师职称、年龄、学历、学缘结构等还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大学管理水平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除了硬件外,还有软环境。我国的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更多的体现在“形似”而不是“神似”上。是“数量”的增长而非“质量”的提高,是“外延”的扩张而非“内涵”的提升。是“硬件”的加强而非“软件”的改善,这就是大家谈到的包括内涵建设和软实力的问题。

#### **4 加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要加强政府投入,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加快构筑人才高地,积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 **4.1 加大政府投入,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在当今社会,建设一流大学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兴衰的大问题。德国在实施精英计划前,政府不断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大学科研经费捉襟见肘。一批年轻有为的拔尖人才纷纷流向国外科研条件更好的大学,造成德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才流失,使德国科研面临重大危机。“精英大学”计划通过向高校提供巨额经费,不但能够帮助高校改善研究的硬件设施,留住本土优秀的教授、科研人员,还可聘请各个领域的国外优秀学者及高级学术人才,使德国重新成为汇集各个领域精英科学家的重要基地。

目前,我国政府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阻碍着高等学校的快速、健康发展。从本次全国人大会议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2001年至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8%,2006年有所突破,达到了3.0%,但与1998年政府承诺的4%仍然相差一个百分点,而其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又仅占GDP的0.6%,这在全

世界也是属于较低水平的。因此,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一流大学的建设,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财政上持续加大投入,政策上强有力的引导和支持。

#### 4. 2 加强学科建设,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整体水平

学科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学术地位的主要标准。学科建设的水平直接反映了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实力。有了一流的学科,就能吸引到一流的教师,就会有一流的教学和科研,就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众多一流学科的集合就成了一流的大学。如果把一所学校比作一棵大树,学科建设就是它的根和主干,学科发展的状况对于高校的发展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因此,抓住了学科建设,就抓住了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就能够起到提纲挈领,统领全局的作用。考虑到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实际,首先,借鉴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集中力量建设关键学科,保证学科方向独具特色。从国际经验看,除少数大学外,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一般是综合性大学。但是,综合性不等于全学科,所有学科都要建设。同时,综合性也不等于各个学科发展齐头并进,没有重点,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整体办学实力与学科发展固然都处于一流水平,但也就有几个学科处于世界顶尖的位置。例如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美国二战以后发展最快的大学。这和大名鼎鼎的“硅谷之父”特曼教授密切相关。校长肯尼迪说:“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曼非凡的远见卓识。”20世纪50年代,身为斯坦福副校长兼教务长的特曼大胆地提出了“学术尖顶”的构想,决定打破所有学科方向均衡发展的传统做法,采取特殊措施,吸引冒尖人才,重点发展一些有条件的科系,以把它办成学术尖顶。为此,特曼首先选择了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三个学科作为突破口。经过特曼等人的努力,斯坦福大学很快一跃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尤其是其电子工程学科和“硅谷”一起已成为世界各国著名研究型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一个样板。其次,冷静分析,发掘自身特色与优势,把有限资源投入到最能见到成效、最具发展潜力、最具长远效益的学科方向上,以学科内涵发展为主,外延扩展和内涵提升相结合,打造学科品牌。高

度关注未来学科发展,选择对未来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学科方向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学科方向,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20世纪60年代由两个学院组成,根据其规模小、资源少的情况,学校抓住信息技术作为学校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并不断取得突破,同时也带动了学校机械等学科方向的发展,由于较好地定位了学校的学科建设方向,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成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 4.3 加强“领军人才”的引进,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领军人才”的引进,由于“领军人才”出类拔萃的科学素养、卓越的领导才能、独特的人格魅力、坚韧的拼搏毅力、强大的团队凝聚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围绕领军人才就会形成学术团队,并且因为拥有若干个学术影响大的团队使大学保持持久的创新能力和显赫地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之初,是一所工科院校。20世纪30年代,学院确定了发展理科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领军人才及其形成的学术团队。于是,在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斯莱特任物理研究室主任,又聘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哈里森任物理系主任之后,理科的教学科研力量大大加强,从原来只承担基础教学任务的辅助系,上升为与工科并驾齐驱的教学与科研基地。而加州理工学院作为小而精式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之所以能在美国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实验物理和航空技术位居世界顶尖水平。加州伯克利分校原校长田长霖在解释这所大学的发展时说,加州理工学院的腾飞就是靠两位教授,一位是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他使学校的实验物理学步入了世界一流行列;另一位就是将美国航空技术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冯·卡门。有了这两位大师,这所学校很快就世界知名了。领军人才及其周围形成的学者群体和学术团队,带动大学组织整体事业的振兴,同样的道理在同济大学汽车学科也得到了验证,上海《文汇报》在介绍同济汽车学科成果时,用了一个标题:一个人带动了一个学科。这个人是指当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留学德国的汽车博士万钢,因万钢使同济才有了一个汽车学科团队。

#### 4.4 改革高校管理机制,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保障

当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

“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的出发点、量化考核的手段、急功近利的导向、制度性外在行为控制的特征。”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没有给需长时期艰苦努力、“十年磨一剑”才能作出创新性精品成果的科研课题的实施,留下必要的制度空间。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6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会上的讲话中说得非常好:“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但现行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导向只是要“出品”、要数量,相对忽视了对“精”与“质”的强调。实际操作中“只问一年是否磨出了一把菜刀,不问是否能十年磨一剑。

为此,将针对现存问题,以院系为单位,将教师考核与学科建设、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积极探索和建立科学有效的业绩评估体系。对于新建设学科的教师,要根据教育教学规律,提前制定教师补充与培养计划,教师的前期考核以科学研究、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为主;对新上岗的教师考核采用“工作+在岗培养”的模式,把新教师的助课、助管、参加培养培训和实践环节等列为考核的内容,适当减少课堂教学工作量的考核;对于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的考核,以写实性评估和定性评估为主。

总之,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应该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博彩众长,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办学理念,真正起到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摘自:科研管理2008年第29卷增刊)

##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缺失与建构

孙孝文

为了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大学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我国提出了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通过“211工程”、“985工程”的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不可否认,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有利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缺失是重要因素,包括大学分类评价制度、校长选拔制度、经费投入保障制度的缺失等。

### 一、大学分类评价制度的缺失

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政府主管部门首先要对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清晰的界定,制定比较明晰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指标和考核制度,才会使大学在建设过程中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现在政府主管部门对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明确的评价方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产生的大学分类概念,是从研究型大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层次,介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般研究型大学”之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高水平”和“研究型”两个方面对大学提出了要求。关于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我国主要是参考“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分类法,非政府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民间分类,比较有影响的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研究员等将现有高校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形成“高校圈层论”,将重点大学分为四个层次,即北大、清华为第一层次,“985”大学为第二层次,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为第三层次,“211”大学为第四层次。国家按不同层次给予不同的投入,主要扶持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大学,希望在这两个层次大学中产生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无论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四型论”,还是“高校圈层论”,或是其他学者的分类,其基本思路是以科研规模、研究生人数等数量方面的特征数据为主来评定研究型大学。但我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由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近年来增长迅速,而且招生指标由政府审批,科研经费的申报审批等也有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一些科研项目的申报、科研经费的分配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科研的创新性以及效用还有欠缺。至于“高水平”的界定,似乎“高校圈层论”中界定的第一、二层次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但这是针对现状而言的,具体到我们应建设的“高水平”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

现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适用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分类的标准。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除具有研究型大学的一般特点外,还应具有我国大学自身的一些特征,以及我们要达到的“高水平”大学的标准。目前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在高校分类上持既不赞成、不反对的态度,也没有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教育部在网站上表示:对各类排行榜评选的指导思想和操作过程不了解,因此对其客观性不作评价,并明确表示不会做任何关于大学的排行榜”。由于主管部门在“中国的大学排行榜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状态下的消极作用,使大学和公众在“100多个大学排行榜”所提供的纷乱的大学分类信息面前不能有效遴选和使用,造成“现在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许多提法和做法已走入歧途和误区,片面强调西方标准、特别是美国标准,用这些标准来束缚中国大学的探索与追求”的不良影响。

## 二、校长选拔制度的缺失

从历史来看,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大学发展的快与慢,客观上讲和大学校长有直接关系。我国公立大学校长的选拔现在实行的是与党政机关领导选拔相同的模式。教育部属重点大学的校长都由教育部考核任命,“985”大学的校长则由我国官员最高选拔机构中组部直接任命。在选拔过程中,近年来开始组织民主考查推荐,但其意见仅具有参考价值,对最终决定校长人选并没有直接作用。大学具有和党政机关不一样的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关于大学校长的选拔制度,由此造成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大学校长行政任命色彩较浓。我国被批准为“985”大学的大学校长一般被定为“副部级”,所以进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行列首先不是学术贡献的荣誉,而是利益的诱惑,一旦进入这个圈层,则机构升格,人员升官,学校地位也被行政规定为高一等。更有甚者,政府将官员直接派驻大学任校长或校领导,“近年来对若干重点部属高校主要领导的任命,以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升任部属重点高校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增多”。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这些官员可以凭借原来的“关系”为所任职的高校争取更多的公共资源,加剧了高校

间不平等竞争,影响了教育公平,同时也强化了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直接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为一批有资历的“司局级”官员晋升“副部长级”提供了一条途径。但这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会造成什么影响,是值得寻味的问题。

二是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与职业经历都显现出单一化,学术背景大多属于理工科,职业经历大部分是从本校毕业或在本校工作后“原地起跳”的“本土式”领导。他们往往是专业上有建树就被提拔做领导直至担任校长,缺乏必要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积累,主要是靠大学已有经验和传统的沿袭进行行政、教学方面的管理,或者是靠校长个人摸索着前进。尽管让学者或高层官员来当大学校长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实际上容易造成对大学管理工作的效率不高,使得一些有才干的大学校长无法受到重用。

### 三、经费投入保障制度的缺失

从教育经费的宏观投入来看,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中,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1993~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波动的,平均只有21.8%,直到目前也没有达到占GDP的4%的要求。与该目标相比,教育经费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14年累计缺口15710.44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2.67倍。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人均GDP 600~2000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为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1:2.5:9.2。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在20%以上。2000年我国人均GDP就达到856美元,2006年达到2000美元,如果按高等教育经费占20%的比例计算,则2000~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缺口达到1905亿元,和目前高校存在的约2000多亿元债务的情况一致。而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3年就开始出现连续下降,在2000年前后甚至出现

负增长。2001~2005年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增长率(%)

分别为- 6.75、- 9.36、- 6.56、-3.81、- 3.18, 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增长率(%)分别为-10.53、- 6.13、- 4.12、- 2.30、-2.65, 从2006年起开始恢复增长。

从微观来看, 高校内部经费分配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经费使用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以教学经费为例, 200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 “学校学费收入中用于日常教学的经费一般不应低于20%, 用以保障教学业务、教学仪器设备修理、教学差旅、体育维持等基本教学经费”。教育部《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又提出: “学校学费收入中用于日常教学的经费不得低于25%”。据此,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标准中四项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C级调整为 $\geq 25\%$ , A级调整为 $\geq 30\%$ 。这些政策规定虽有一些积极作用, 但因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 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 其执行的强制性大打折扣, 导致经费投入不稳定。如近几年各大学为了达到本科教学评估标准, 集中加大了教学经费的投入, 但教学评估一结束, 教学经费马上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并不是个别现象。

“211工程”、“985工程”虽然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 那只是相对于其他没有投入的大学而言。由于国家宏观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和高校微观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大学所具有的共同问题, 尤其是在教育经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 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施特殊政策是以牺牲其他高校的利益为前提的, 妨害了教育公平原则, 客观上加剧了尚未“达标”的高校争设专业、争合并、争升格、盲目扩大招生的趋势。而且这种短时期的集中财政拨款倾斜政策只能是临时性措施, 具有一定的暂时性和随意性, 不可能形成一种长期的经费投入保障制度。

#### 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制度的建构

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是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人们认为制约大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和人才, 其实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只是表面现象, 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的竞争, 好的制度可以吸引资金和人才, 而不好的制度则使资金和人才流失。从现

代大学制度发展来看,研究型大学的理念首先来源于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所创办的德国柏林大学。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三原则”,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统一。大学自治是强调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学术自由是强调大学与教授的关系。这些原则已经发展成为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推动西方大学改革和培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构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成长制度中,要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大学自治”在我国来说体现为大学办学自主权。尽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高校成为依法办学主体的法人地位并没有真正确立。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在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从大学的管理者、控制者变成引导者、服务者。

在高校分类评价方面,建立突出以“人”为核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评价体系,即围绕高水平的师资、高质量的生源、高素质的毕业生来构建指标。建立公开和公平选拔、建设、考核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减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主观评价的影响,改变重点建设哪些大学由政府主管部门运用行政权力来决定的局面,用制度保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在具体的评价活动中,主管部门从“掌舵人”、“划桨人”的双重身份回归为“掌舵人”的单一身份,不直接组织和参与评价;建立评价业务委托制度,将“划桨人”的职能从政府主管部门中剥离出来,充分发挥高教学会、高校协作组、专业建设委员会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可比性。

扩大办学自主权首先要保证大学自己选举校长的权利,要建立大学校长直接选举制度。采用竞聘方式,校长人选不受地域或单位的限制:既可以是本校的教授,也可以是其他高校的教授;既可以是国内公民,也可以是国外人士。由本校知名教授、杰出校友、在校学生的代表以及独立的校外专家组成考评组,竞聘者向学校师生阐明自己对大学办学的理念、对大学发展的设想,师生直接投票选举校长,然后根据校长提名选出副校长,副校长一般应为本校教授。考评组主要负责对竞聘者资格的审核以及保证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在校长举荐、

考核中主要突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职业背景、领导能力、教育理念等方面的要求,选举结果只需报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减少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直接干预和行政色彩,增加教授在大学校长选拔中的话语权。

建立经费投入责任追究制度,把教育经费投入达标作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硬指标纳入政府及主管部门政绩考核体系,从制度上保证各级财政性

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增长。强化教育经费投入制度执行的强制性,对没有完成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任务的负责人追究责任。在主管部门对教育经费的具体分配和投向上,成立有大学知名教授、校长代表等参加的经费预算委员会,并引入经费分配的竞争机制和公示制度,尽量减少主管部门主观因素的影响;建立大学对政府教育财政预算及其执行以及大学师生对大学经费的分配使用的监督制度,大学师生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参与教育经费的支出选择,从财政制度上保证教育经费使用的合理性。

(摘自: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4期)

发送范围:校领导

---

主编:丁三青 副主编:谢广元 责编:祁慧勇 本期编辑:杜卉卉

---

电话:0516—83590382, 83590385 E-mail:fzghc@cumt.edu.cn

---